

戴逸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问题

戴逸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

2011-05-03 14:46:30

来源: 《学习与研究》

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大问题。中国是个文明古国，历史悠久，我们在这样一个文明古国里建设社会主义，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是什么呢？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、发展，即它产生于什么样的环境，是怎样发展的。对中国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因素，有经济条件、政治结构、社会结构、地理环境，这些都影响中国文化的发生、发展。

首先，中国是农业社会，6000年以前，中国就种植农作物。在中国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，商品经济不发达。在这样一个农业社会里，民族性格既有勤劳朴实的一面，也造成了稳定、保守、散漫的一面。

其次，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、政治结构是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。从秦始皇算起，已有2000多年了。专制主义、官僚结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打下了很深的烙印。

第三，中国是个宗法、家族制度普遍盛行的国家。人们从小到大，生活在一个宗法结构中间。宗法意识、家族意识非常强烈。中国文化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形成的。

第四，地理环境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。中国在亚洲东部的大陆，东面是海洋，西北是高山、沙漠，将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。跟其他文化发达地区隔得比较远，交流比较少（当然历史上也有过交流，如丝绸之路，但这种交流比较少）。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系统，不同于西方文化。

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，但它有个主干、核心，这就是儒家文化（以孔子为代表）。当然，儒家文化本身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很大的变化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各学派“百家争鸣”，儒家只不过是许多学派中的一派。汉代，董仲舒发挥了儒家学说，使其成为统一的专制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，成为官方文化。汉代儒家不同于先前的儒家了。以后，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，儒家也有变化，它吸收了佛学。到宋代，产生了程朱理学、新儒学。儒家文化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很复杂的变化过程，也吸收、融会了其他文化，很明显地吸收了道家、法家、佛教思想，也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。所以一部文化史就是文化的传播、交流、冲突、融合的过程。

中国文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成长，但它也有过与外来文化的接触。大规模的接触、交流有三次。第一次是佛教的传入。从东汉起，历经几百年，开始是比较粗浅的佛教教义的传播。但经过长期的消化，文化的整合，到唐代，发展到高峰，产生了中国化的佛学——禅宗。到宋代，产生了在佛学影响下的儒学。佛教的传入经过了几百年的过程，这是中国与印度文化的一次大交流，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大。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是明清之际，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，从利玛窦到汤若望、南怀仁，从明末到康熙年间，100多年期间，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有好几百人，带来了西方的宗教，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，包括天文、历法、数学、武器、地图、建筑、绘画和其他自然科学。100多年的时间，西方译著和传教士随身带来的科学仪器也很多。但雍正、乾隆年间，这种交流中断了。原因很复杂，当时中国对西方缺乏认识，所以没有形成一种吸收融合西方先进文化的潮流。第三次文化交流是在鸦片战争以后，外国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，中国被动地吸收西方文化，形成中西文化的冲突，又是交流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样的吸收、交流、冲突，到现在还没结束。当然，现在封闭的局面已打破了，不可能再回到历史上那样的闭关状态。中国已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中，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将在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的同时，随着全人类文化一起前进。

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是重视人际关系。在中国，伦理道德、历史学这一类学科比较发达，而不太着重于对自然的研究，不着重于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，所以中国自然科学相对来说不发达。

中国编《四库全书》时（这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盛时，也是中国古文化的一个总结时期），法国像狄德罗、卢梭等百科全书派正在编《百科全书》，通过这两部书的比较就可看出东、西方知识结构的不同，也可看出东、西方文化性质、价值观念的不同。当然古人对自然科学也不是漠不关心，但不是像西方人那样把它作为一个纯客观的对象，排除主观性去研究它；而是用“天人合一”的观点，用主观的思想感情、主观的意象赋予自然界以种种意义。中国的诗文里讲自然的很多，都是以自然界为题材，但是这只是叙述，并不是用科学的眼光去研究它；是欣赏它的美，而不是追求它的真。所以中国文化的特点，比较着重于人际关系，有人称之为人文主义、重视人，但我认为人文主义是西方的思潮，有它特定的内容，恐怕跟中国的传统文化还不是一回事。

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际关系、重视人，是将人放在伦理规范中来考虑的。不是肯定个人价值，而是肯定个人对其他人的意

义。它的积极意义就是重视人的历史使命，它讲人对社会、对别人的关系，强调人要对社会、对别人做出贡献。但它也有消极的一面，就是忽视了人本身的权利，它把人的价值过分地放在对别人的关系上，而不在自己本身。它讲伦常关系、君臣、父子、夫妇等这一类，都是在讲人和别人应处在一种什么关系中，但是这个社会给人以什么保障呢？它忽略了这一点。

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同政治结合得比较紧密。2000多年来，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，而且深深渗透到国民性中，它同官方结合得就非常紧密，是官方哲学。“学而优则仕”，其治学目的就是做官、入世。儒家有它积极的方面，即它是入世的哲学，不像佛家。儒家重视文化对社会的作用，所以儒家有许多名言。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，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等等。它强调要治天下，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。但是它密切结合政治也产生了另外一种缺陷，即依附于政治，经常以官方标准做判断，把很多事情都附会到政治上去，甚至彗星出现、火山爆发、地震等自然现象都成了被附会的对象，成为天人感应的一种现象，认为政治上有失误，天上就要“示警”。另外，缺少自由的创作，凡是不合于官方口味的，都被称为异端思想，所以中国古代的思想迫害屡见不鲜，文字狱历代都有，政治干预文化就会产生消极的后果。

中国文化第三个特点是带有非常强烈的宗法家族色彩。中国没有统一的像西方那样强烈的宗教，没有那样大的教权（西方的教皇在中世纪甚至比国王地位都高），但是族权——宗族的权力、家庭的权利很发展，它实际上控制着老百姓。老百姓把两个东西看得最重要：一个是真命天子——皇权，一个是老祖宗——族权。政权跟族权的势力渗透到各个方面，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、文化生活中起极为重大的作用，“君”和“父”是中国人的两个最重要的概念。“无父无君，是禽兽也”，也就是说，人和动物最主要的区别，就在于人有“君”和“父”。与“君”和“父”相应，就是中国道德观念规范中“忠”和“孝”。忠臣、孝子是最完美的人格。所以宗法家族在中国人心中是很重要的，在国民性格中也是很重要的。这还可以从中国古人有两个重要的生活目的——（1）光宗耀祖；（2）传宗接代——看出来。

光宗耀祖。人活着是为了使他的家庭光彩，个人奋斗、读书应举、做官发财，固然是为自己享受，但他更大的目的却是光宗耀祖，给家里立个牌坊或挂一块匾，或者给家里修坟扫墓。

传宗接代。就是生儿子，把家族绵延下去。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”所以人生活的目的就是家族的延续和家族的昌盛。

上面提到的“孝”，我想也应该分析，它当然有好的方面，即它是对父母的正当感情、正当态度。赡养父母、尊敬父母，理应如此，但是如果把这种感情提升到一个道德原则，并且加以绝对化，就必然会产生许多流弊。中国古人心中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呢？不是个人的死亡，甚至不是国家的灭亡，而是宗族的灭亡，灭族之灾是最大的不幸。比如中国古典小说《红楼梦》，它是一个悲剧，讲的是封建大家族的没落。

下边我再谈一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方法。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似乎比较注重直观、着重于体验，相对来说在推理分析上比较薄弱。中国人思维方法的特点是先直觉到某一个真理，然后用比喻或类比等方法来表现这个真理，用例证的方法来加强、说明这个真理。缺少从未知推到已知的过程（并不是没有，但这方面比较薄弱）。

读中国思想家的书，读中国古代的经典，往往感到有深刻的哲理，但是其思想是跳跃式的，在他们的体会中想象的色彩比较多，比较凝厚和强烈，所以它有许多精彩的片断，有许多闪光的颗粒，但是不连贯，缺乏多方面的论证。中国古代圣贤喜欢用格言方式来表达思想，这些格言没有展开，没有充足的论证，比如《论语》。它的道理就几句话或一句话，“有朋自远方来，不亦乐乎”，只有一句话，这个《论语》就是语录式的。老子的《道德经》也是非常简练。宋明理学家许多语录也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，在一两句话中讲一个生活的道理。简短有力，把真理浓缩在片段中间。这同西方著作不太一样，西方的著作都是大部头，让人看了以后，觉得很繁琐。当然，这只是相对而言。

中国的艺术也有其特点——强调写意，而不是写真，现代的中国画采取了西方的一些表现手段，古典的中国画中的人很小、很远，画在山水风景中间，强调的是人跟景的交融，人在景中，不是强调人的面目；“传神之笔”要传神，不像西方油画那样写实、写真。油画创作很真实，简直像照片一样，它讲究比例、线条、透视、色彩等等，画人要画模特儿，要讲骨骼肌肉。国画不讲求这些，画人的比例也不大对，脸大身子瘦。中国的戏曲好像也有这种情况，也是表现神似，只求意思到了，而不是把真实的细节、生活中的真实都全盘托出。

中国人表现感情比较含蓄，保持分寸，保护感情，封闭自己的内心世界，不是无保留地表现。文化人与野蛮人是有区别的，他不能毫无节制地发泄感情。文化的作用之一就是在内心世界设置一层帷幕或纱巾，或薄或厚挡住内心世界。中国文化设置了较厚的帷幕。人类的喜怒哀乐本是自发的、本能的，如果毫无节制地让它泛滥，就势必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冲突。中国文化集中在人际关系中，因此感情世界的面纱较厚，按一定规范、程式办事。所以中国人表现感情没有采取像西方的接吻这一类方式的，而是用打躬作揖，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感情。

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几个概念是值得注意的：首先是儒家的中庸。关于中庸已经写过许多文章了，中庸这一概念承认对立面的矛盾，统一，但解决矛盾的方法是矛盾的缓和、调和，更多地强调了事物统一性的方面，保持一种和谐。中庸之道是不走极端，防止矛盾的激化。要理解中国文化，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。第二个概念是礼义。这也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范畴。对个人来讲，就是“克己复礼”，约束自己的欲望、自己的感情、自己的利益，不然就会引起冲突。“礼”是调解人和人关系的准则，也是工具，“克己复礼”既是理性的克制、自觉的克制，又是一种强制性的克制。人必须按礼义来办事，把自己约束在一个人际关系规范里。“礼义”不仅约束个人，也约束国家、家庭，于是有了“礼义之邦”、“礼义之家”等。中国人向来自称是“礼义之邦”，强调礼义，不重视法，礼义和法是相对的，“礼”带有更多的自觉性，带有更多的教育的性质，“礼教”形成一种“讲礼”的风气。而法更多的是强制，中国古代强调了“礼制”，而不强调法制。中国的法也有，而且在古代还很发达。但中国的法也有特点，即它似乎是专用来惩罚人的。一提法家就让人想起严厉、刻薄和无情无义来。所以，中国古代的刑法特别发达，民法不发达。对那些破坏社会制度、损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者惩治性很强，而那些财产纠纷、婚姻纠纷等老百姓日常间的冲突却不是付诸法律，而是由家族来处理，不惊官府。由此可见，古代法规打击什么是很明确的，但它保护什么（老百姓的正当利益等理

应置于它的保护之下)就不明确了。归结为一句,就是法制不健全。还有就是“义利”的观念,重义轻利,强调道德修养,强调主体性的自我完善,而不着重于物质利益。《孟子》开章(孟子见梁惠王)第一句话,“王曰:‘叟不远千里而来,亦将有以利吾国乎?’”这话是很正常的,但孟子却当头一棒,说:“……王何必曰利,亦有仁义而已矣。”然后是对梁惠王的教训,最后他的结论是:“上下交征利,而国危矣。”孟子把利和义对立起来,重义轻利。儒家文化追求的是自我的道德完善,孔子最好的学生颜回“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”,“人不堪其忧,回不改其乐”,这是孔夫子对他的道德修养的称赞。轻利重义,当然有其积极性的一面,这种思想培养许多为正义、为良族大业而奋斗的有高尚人格的人,不重视个人享受,讲究气节,讲究人格,追求自我的道德完善,“富贵不能淫,贫贱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,不向权势低头。所以,在儒家所强调的“杀身成仁,舍生取义”的熏陶下,产生了一些英雄人物。但这种重义轻利也产生其消极的一面,轻视商人,轻视商业,过分地、绝对地强调人的道德完善、道德修养,其结果就使人的正常的要求权利受到压抑,到宋元时就发展为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,人的欲望被消灭了。走到极端时,这种道德就变成对人的摧残。

文档附件:

隐藏评论

用户昵称: (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) 匿名

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。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(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)

5015

中国社会科学院电话: 010-85195999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: 010-84177865; 84177869 Email: skw01@cass.org.cn

投稿邮箱: skw01@cass.org.cn 网友之声信箱: skw02@cass.org.cn 地址: 中国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

版权所有: 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